



抗战时期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初探

叶 铭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的军令部最重要的职掌是战时的作战指导,作战指导及实施是将抽象的战略思想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军事学上的作战指导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作战指导是军事战略思想的转化,狭义的作战指导则是野战战略的转化。军令部需要贯彻持久消耗的军事战略,同时在会战(野战)的作战指导中将野战战略转化为作战计划并督促实施。然而,战时国民党军尽管确立了持久抗战的战略,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至于正面战场历次会战均未能占据主动,广为诟病,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更是失地千里、损失惨重。因此,梳理军令部的作战指导业务,了解其具体流程,并通过个案分析作战指导存在的问题,利于深入研究战时中国军事,明晰战时作战指导环节,也可以对战时正面战场军事指挥做出相对准确的评价。

关键词 抗战 军令部 作战指导 战略 “豫湘桂”会战

关于抗战时期的中国战时体制,学术界已有一定的研究,如《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1卷对此问题有比较清晰的梳理。在该卷的第6章《军事体制》中,作者根据过往研究,明确战时国民党军事体制中最高决策机构从最初的国防最高会议最终转变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最高统帅机构从最初的大本营转变为军事委员会^①,并确立军令部为作战指导机关。

史学界对于军令部的研究较少,只有陈长河的《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军令部》^②,该文简要介绍了军令部的组织机构及变化情况、各部门的职掌与负责人员的概况,至于军令部各部门的地位、具体运作、功能及其与军事委员会其他部门的关系,则均未涉及。此外,笔者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过《军令部与战时参谋人事》^③和《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参谋教育体系初探》^④,这两篇文章主要介绍抗战时期军令部在参谋人事及参谋教育方面的作用。在战时国民党军的作战方面,最近研究比较深入的是王奇生与苏圣雄。王奇生在《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⑤中对

① 张瑞德等:《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206页。

② 陈长河:《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134—136页。

③ 叶铭:《军令部与战时参谋人事》,《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第20—34页。

④ 叶铭:《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参谋教育体系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7—120页。

⑤ 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杨天石、臧运祜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332页。





国民党军战略战术回应进行梳理,指出了国民党军在战略决策机制上存在的问题。苏圣雄在《国军于徐州会战撤退过程再探》^①一文中,从军事决策角度,分析徐州会战中国国民党军撤退决策的复杂性,指出尽管在淞沪会战后中国方面已策定持久抗战的战略,但是在实际会战中仍有拼消耗的趋势,揭示了军事战略与野战战略实施的困境。

战时军令部实施的作战指导业务,其实际作用究竟如何,目前尚无以军令部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论著。本文拟运用档案资料与当事人日记以及相关史料,分析战时国民党军最高统帅机构与军令部的关系,勾画出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的制定流程,并以“豫湘桂”会战为个案进行剖析,对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进行评判,指出其存在问题。

一、战时最高统帅机构与军令部

军令部与军事委员会的军政、军训、政治等部业务职掌不同,各部职权范围明确,基本不存在交叉之处。然而一般研究者对于军令部与参谋总长、军令部与委员长侍从室之间的业务及职权范围易产生混淆,因此探讨军令部与军事委员会上述单位之间异同,厘清军令部与最高统帅部中的参谋总长、委员长侍从室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解军令部在作战指导业务中发挥的作用。

(一) 军事委员会改组与战时统帅部确立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统制全国人力物力,适应抗战要求,将军事委员会体制进行改革,设立大本营,增设第一至第六部、后方勤务部、管理部、卫生部,并将办公厅改为总办公厅及秘书厅^②,然而实际运行效果却是“施行数月,缺点仍多”。^③由于中日并未宣战,以全面战争体制为目标设立的大本营不适应战争的进行,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并以军事委员会为战争领导机构。^④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为适应持久战之需要”^⑤取消大本营,进行机构改组。此次改组,“除军政部与后方勤务部仍旧外,以参谋本部第一部合并为军令部,训练总监部改为军训部,第六部及政训处合并为政治部,海军部缩编为海军总司令部,防空处并入防空委员会,总办公厅秘书厅并为办公厅,其余第一至第六部、卫生部管理部仍取消,而将物资之统制则委之于行政院有关之部会”。^⑥1938年1月国防最高会议通过修正后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为战时统辖全国国民党军民作战便利起见,特设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战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数次修改,其定位仍维持战时统辖机构(统帅部)不变,如1940年修改为“国民政府为巩固全国国防统辖全国军民作战,特设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1943年则改为“国民政府为巩固全国国防,统辖全国军民作战,设置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⑦概言之,军事委员会承担战时军事统帅机构的职责。

战争爆发后,何应钦连续召开了22次统帅部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中国的军事实力及有关

① 苏圣雄:《国军于徐州会战撤退过程再探》,吕芳上主编:《战争的历史与记忆1:和与战》,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299—320页。

②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2),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筹)1986年编印,第68页。

③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2),第68页。

④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页,注释9。

⑤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第663页。

⑥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2),第68页。

⑦ 《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1943年12月),周美华编:《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军事委员会(1)》,台北,“国史馆”1996年版,第78、83、90页。





军事情报,对卢沟桥事变后的中日战事作了部署^①,会议参与者包括军政部部长、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办公厅主任等高级官员^②,此种会议的形式其后被采纳,成为军事委员会的一种固定业务办理形式,统称为“会报”。军事委员会作战会报(以下简称“会报”)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会报,具体讨论战时作战指挥的决策。1939年前,历次作战会报蒋介石基本没有缺席,然而1939年之后由于“委座现在甚忙,不愿多批公事”。^③蒋介石只在重要战役、会战发生时才参加会报,平时会报即由何应钦主持处理^④,但重大决策必须经过蒋介石批准方能生效。

军事委员会下辖的各部会与各战区即构成了中国战时的指挥系统。战时军事统帅决策通过军事委员会的作战会报进行,这既是军令部制定作战指导的主要依据,又是军令部实施作战指导的平台。

(二) 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与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

国民政府战时《组织法》规定“参谋总长为委员长之幕僚长,指导本会(指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部会厅,襄助委员长处理本会一切业务。副参谋总长辅助参谋总长处理本会一切业务”^⑤,其后国民政府几次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参谋总长及副参谋总长的职权均没有修改,参谋总长通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实施其幕僚长权力。参谋总长何应钦是黄埔系中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能够指挥黄埔系军队,与西南地方实力派也有渊源,但并不是江浙集团成员。^⑥他既有资历,又有人望,最为关键的是在抗战爆发后实际上手无兵权,因此既为蒋介石信任又能为各派系接受,是蒋介石军事幕僚长的不二人选。

参谋总长主要职权为组织最高幕僚会议。抗战之初,蒋介石曾主持过最高幕僚会议,其后参加最高幕僚会议的有: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军令部部长、军政部部长、军训部部长、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政治部部长、军法执行总监、后方勤务部部长、海军总司令、办公厅主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铨叙厅厅长、侍从室主任,以及必要时由参谋总长指定主管厅、司、处长,及其他相关人员。^⑦法令规定“会议由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主席,如参谋总长因事故不能出席时,以副参谋总长或临时推定一会员代理主席”,会议目的“为联系军事各部业务及检讨各部工作进度,以求推进全国军事”。^⑧由此可见,最高幕僚会议是由参谋总长组织召开,通过报告事项及提议事项以沟通军事委员会各机构之间的业务联系。报告事项主要为“最近战况;各部会厅业务关联两部以上诸事项;各部会厅经办主要事务之概况;交办事项办理之程度”。^⑨提议

① 杨菁、杨树标:《论蒋介石与抗战期间的军事会议》,《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第76页。当然,召开此项会议时中国统帅部成立与否值得商榷。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凤凰传媒出版集团、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286页),此项会报正式名称为“卢沟桥事件第×次会报”。

② 参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34—286页。

③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39年1月14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④ 根据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2页)记载,“军事指挥人员会议(即会报)开始是由何应钦主持的”。

⑤ 《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1938年1月),周美华编:《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军事委员会(1)》,第78页。

⑥ 熊宗仁:《何应钦传》(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⑦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规则》(1939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页;另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1),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注释。

⑧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规则》(1939年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第13页。

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规则》(1939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20。但是在2月出台的修正稿中,报告事项第一项为“报告国防及作战事项”,比原定的范围要宽泛一些。参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规则》(1939年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第13页。





事项集中在“依作战及整军计划,各就主管业务,提议应行改革与推进各事项;依建军精神,各就主管业务,谋各种法规之完备调整,及推行平时军事设施之建立,与军需工业、国防经济之发展等”。^①从最高幕僚会议报告及提议事项来看,最高幕僚会议工作中心是军事委员会日常业务的讨论、汇总工作。以1939年3月7日召开的第二次最高幕僚会议为例,会议报告事项包括:何应钦报告会议规则与使命,刘斐报告当时敌我态势,贺国光阐释该会议确实推动作战与建立军队的使命。但是,议决事项却是:兵站卫生机关划归后勤,编纂海陆空军沿革史办法等。到了1939年6月9日召开的第五次最高幕僚会议中,报告事项中已经没有与作战有关事项,讨论议决事项也集中在军政、军训等部管辖任务了。^②由此可见,最高幕僚会议在军事上的作用有限,也并非是军事决策机构。

何应钦似乎位高权重,手握大权,但有学者评价“这种过分集中的权位,产生的结果是名实不符。他大事做不了主,中事由各职能部门处理,小事有幕僚们代劳”。^③蒋介石曾经明确告诉史迪威“谈到指挥权问题,他(蒋介石)说完全是他亲自指挥——连何应钦也无法指挥嫡系(蒋介石的‘学生们’)”。^④这一点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也看得十分清楚,“何应钦身兼二职,既是军政部长,又是参谋总长,但实际上,他与作战和军训(后勤除外)方面的问题毫不相干”。^⑤“而且从1938年后,指挥组织的实际工作,全操在侍从室及军令部,何应钦只在组织会报上提些意见,所以参谋总长办公室的参谋,一般都无事可做,反需到处求人。加上以参事、高级参谋调充,名义上也不好听,同学们就不愿跟何应钦工作”。^⑥唐生智告诉陈诚,他与时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参谋的阮绍昌交谈,阮绍昌告诉唐生智,当阮绍昌向何应钦请示指示方针的时候,何应钦回答“对作战不参加任何意见,对人事须经我(何自称)看过”,唐生智认为“为古今中外幕僚长之奇闻”。^⑦由此可见,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军事指挥中并没有发挥与其职务相称的作用。

(三)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以下简称为“侍从室”)与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

有论者称侍从室为“政府中的政府”(The government within the government)^⑧,“除了是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幕僚单位,无意中也成为蒋培养其个人班底的重要机构”。^⑨很多人认为侍从室才是国民政府决策中心,或是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构。实际上,侍从室在作战指挥业务方面是不能替代军令部的。

侍从室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1936年1月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侍从室改组而成,下设第一处处理军事,钱大钧、张治中、林蔚、贺耀祖、商震等先后任主任;第二处掌党政事务,由陈布雷任主任。^⑩侍从室源于南昌行营,最早“没有侍从室名义,侍从秘书、侍从副

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规则》(1939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20。

② 参见《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案》,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国军”档案,0028/003.1/3750.5B/1。其中收录最高幕僚会议历次会议汇编,与实际规则规定并无二样。

③ 熊宗仁:《何应钦传》(下),第473页。

④ 约瑟夫·W. 史迪威著,黄加林译:《史迪威日记》,1942年8月3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⑤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590页。

⑥ 刘劲持:《陆军大学第十一期内幕》,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⑦ 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1944年4月25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526页。

⑧ F. F. Liu(刘馥),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 - 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转引自张瑞德《无声的要角——侍从室的幕僚人员(1936—1945)》,台北《近代中国》第156期,2004年3月版,第142页。

⑨ 张瑞德:《无声的要角——侍从室的幕僚人员(1936—1945)》,台北《近代中国》第156期,第166页。

⑩ 张瑞德:《无声的要角——侍从室的幕僚人员(1936—1945)》,台北《近代中国》第156期,第141页;张令澳:《侍从室回梦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6页;汪日章:《跟随蒋介石六年》,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居亦侨:《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回忆录》,第74—76页。





官、侍卫人员等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称之为“官邸”人员”^①,主要担当蒋介石个人的秘书及侍卫工作。侍从室部分被“定位为政策设计部门,不负责实际执行”。^②战时指挥大权操控在蒋介石手中,侍从室只是蒋的私人幕僚部门。

侍从室第一处(负责军事,主要是第二组)及第二处第六组(负责情报)的职能与军令部存在交叉。其负责人一般被视为幕僚长。第一处下辖三个组,第一组即总务组,第二组掌管军事事务,第三组是警卫组。“第二组有侍从参谋多人,主管作战、人事参谋、情报参谋、交通后勤参谋和军事文件,还绘制军事地图。侍一处主任坐镇第二组,拟办和审阅军事机要文件”,该组汇集了不少对军事问题有研究、有造诣的军事参谋人才。^③军事委员会各部及各战区呈报蒋介石的报告、请示、函电等文件,都归其办理。^④所以其业务是处理指挥系统呈报蒋介石的各种文件,并没有自主处分的权力,只是军事秘书而已。曾任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认为实际上侍从室是沟通蒋介石与指挥系统各部门之间的渠道。“那时,我自己觉得:这(侍从室)是一个主管军事很机要的地位,恐怕做不好……当时,我始终保持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一定要站在最高统帅的立场,与军事委员会各部门协调,尤其要与军令部、军政部保持协调,并且要予各主管部门以便利,使下情上达”。^⑤然而“蒋介石位高权重,尤以抗战时期,集党政军各要职于一身,凡对军队、对官署、对属僚,动辄以手令行事,日久成癖”^⑥,侍从室是负责传达蒋介石手令的机构,似乎“口含天宪”,但其职权仅是作为幕僚处理文书,对于指挥系统的意见、建议进行节略上报蒋介石定夺。由于侍从室无形中被赋予了蒋的代言人的身份,下级机构很难判断其下达的指令哪些是蒋自己的意思。加之侍从室的工作人员因为能够参与机要,他们在事后的回忆中可能放大自己的地位与责任。所以,侍从室在决策中的作用被放大并神秘化了。客观而言,侍从室人员的确可以参与处理机要事务,不过他们仅仅有建议权而已。

侍从室并没有独立的人事权,蒋介石对待从室工作人员管理甚严,因此他们并不敢“假传圣旨”,“挟天子以令诸侯”。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任职时间较长的是林蔚与张治中,这两个人性格都是埋头做事不出风头。张治中出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给自己定的行为准则就是“严守机密;明识大体;寡言少主张”,并要求自己做到“和协各方;分忧分劳;善处请托;事必躬亲;持以勤慎”。“在工作上面,很少使蒋操心”。在作战中,“对于军事上的建议,对于最高统帅的意旨到达于战区高级指挥官,都很周到、正确,没有什么错误。如湘北大捷诸战役,都是由蒋亲自指挥,而我不折不扣地传达了命令。蒋常常在深夜打电话找我,对白天打入的电报命令加以修改、补充;或是叫我立刻打长途电话,传布命令到前方”,能够“站在最高统帅的立场,与军事委员会各部门协调,尤其要与军令部、军政部保持协调,并且要予各主管部门以便利,使下情上达”。^⑦林蔚“办事精细,不辞劳苦;善于沟通协调;谦冲为怀”^⑧,是一个做事低调、善于为人处世的人物,他曾经说过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君臣之间有一个距离不可逾越”。他对自己能力有清醒的认识,“做事要量力而为,我可以做的事做,不能做的事不做”。^⑨“长于谋划,偏重于战区战役之规划,把自己对战争的理解及时贡

① 汪日章:《跟随蒋介石六年》,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回忆录》,第26页。

② 张瑞德:《运筹帷幄: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与南昌行营的政策制定(1933—1935)》,《走向近代》编辑小组主编:《走向近代:国史发展与区域动向》,台北,东华书局2004年版,第349页。

③ 居亦侨:《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回忆录》,第74、75页。

④ 张令澳:《侍从室回梦录》,第14页。

⑤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页。

⑥ 孙武:《蒋介石手令处理规程考略》,《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第136页。

⑦ 《张治中回忆录》,第295—296、298页。

⑧ 张瑞德:《无声的要角——侍从室的幕僚人员(1936—1945)》,台北《近代中国》第156期,第156—157页。

⑨ 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於达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115页。





献给蒋介石,关于文书和一般参谋业务的处理,则交由他的助手於达负责”。^① 张治中与林蔚的性格符合蒋所定《侍从人员训条》中规定须严守的“谦恭、言谨、慎行、廉洁、细心、敏捷、切实、勤俭、肃静、自强”^②的十条要求。无论是张治中还是林蔚,“虽有统军的能力,却不是军事理论家。他们忙于军事事务,缺少军事战略的研究”^③,张治中在协调上下关系方面不遗余力,不会主动干扰指挥系统运转。至于林蔚,是徐永昌陆大第4期同学,曾出任过军令部次长,也不会主动干涉军令部军事战略计划制定与指挥。

尽管侍从室与军令部业务有重合,但对军令部的实际业务影响并不明显。首先,侍从室参谋人员较少,无法像军令部那样有参谋群,可以群策群力发挥作用。其次,侍从室“挑选陆大各期毕业和曾留学英、美的军官任侍从参谋,并将侍从室原有少数参谋人员,先后送陆大深造”,“至抗战中、后期时,侍二组的参谋人员,几已全部出身陆大”^④,陆大由军令部管辖。且军令部曾拟定《侍从参谋实习与训练办法》,侍从室的侍从参谋是由军令部推荐的。在业务方面,侍从室第一处“接到军情电报后,摘要呈阅,由侍从参谋按照军事电讯或作战计划,在地图上移动红、黄、白三色三角小旗……蒋介石一面批阅电文,一面观看地图,掌握军事形势……作战时,地图上的标记,都出自作战厅长刘斐之手”。^⑤ 侍从室第一处只负责汇报战况,并不制定计划。就作战计划而言,侍从室是将军令部或各战区呈交军令部的计划进行摘要浓缩后呈给蒋介石批阅。^⑥ 由是观之,军令部与侍从室在军事上各有侧重。军事计划拟定或军事情报获取,其职责均在军令部。

二、军令部与作战指导

军令部在战时实施作战指导业务,根据资料探讨作战指导业务具体由哪个机构负责,又如何开展,有助于了解战时军令部实际业务的开展,明晰其职责。

(一) 军令部作战指导机构

军令部是由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和原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合并组建,其职责主要在军令方面,也就是主要负责战时作战指导。^⑦ 原来的第一部(军令)是分管作战事务的部门,第一任部长黄绍竑回忆“我担任第一部部长,系主管作战计划与作战命令的”。第一部成立后,主要就是“东拼西凑的,将一个机构组织成功。并拟具初期的作战计划”。第一部成立后不久,大同失陷。而“大本营的作战计划,必须确保山西,方可阻止敌军沿平汉路平原南下……大同的陷落,不但影响华北军事的全部计划,并且要影响全国的战局”。^⑧ 蒋介石遂命令部长黄绍竑到山西视察,第一部

① 杨斌:《蒋介石的幕僚“专家”——林蔚》,《钟山风雨》2003年第6期,第18页;唐纵日记中则记“林主任之作风,工作以各部为主体,侍从室不宜多作主张,最好少出意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2年12月15日,第326—327页);唐纵也曾评价“林主任对于业务,颇置重于军令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3年1月7日,第334页)。

② 蒋介石:《侍从人员训条》,《感恩与怀德集》编辑小组编:《感恩与怀德集:我们常在蒋公左右》,台北,应舜仁2001年版,第3页,转引自张瑞德《无声的要角——侍从室的幕僚人员(1936—1945)》,台北《近代中国》第156期,第150页。

③ 杨跃进:《蒋介石幕僚的思想研究》,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④ 张瑞德:《无声的要角——侍从室的幕僚人员(1936—1945)》,台北《近代中国》第156期,第147页。

⑤ 居亦侨:《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回忆录》,第79页。

⑥ 《张治中回忆录》,第299页。

⑦ 徐永昌在其1938年1月13日日记中有“六时许访哲民,渠拟定军令部编制草案较前参谋本部少八十余员(第一部改为军令部,参谋本部并入之,前参部二百九十余职员,今二百人)”,1月19日有“五时往蒋先生所,为归并参谋本部成立军令部事”的记载,亦可证明军令部的机构来源。参见《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8年1月13日、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

⑧ 黄绍竑:《五十回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36—337、340页。





的军令任务则在蒋介石的亲自监督下由第一组组长刘斐执行,加之第一部“系临时作战机关,所有服务人员,皆由各部调用,未曾特设专官”,造成“第一部人事问题颇杂”^①,职员“视本部如逆旅,置公务于等闲,或动以回原衙门为心,而敢于怠慢恣肆”^②,其混乱倾轧情形连白崇禧都有所耳闻。^③“结果与计划相去甚远”^④，“施行数月,缺点仍多”^⑤,故第一部在战争初期并不能切实发挥机构效能。

有鉴于此,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曾经建议“依据贵国(指中国)目前状况,似应将海陆空军兵力直隶陆军总司令指挥,换言之,即海空两军只能作陆军的辅助兵种,并宜于最高统帅之下设一总参谋长,以总其成,下设陆军、海军、空军三参谋长,以辅助之,故在战术方面,海空军应在军令部之下,但在补充上仍应有其独立性质。其次,关于炮兵,亦应独立(受军令部之指挥),而军令部除命令之发布及前线战斗力之补充外,其余后方一切事宜应由后方勤务部办理,惟仍须受总参谋长之指挥”。^⑥他的规划中军令部相当于陆军参谋部,主要承担作战指挥任务,国民政府采纳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建议。但由于抗战中国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是陆军,海军、空军比较弱小,军令部作战指挥业务作用愈发凸显。

法肯豪森将军认为“战时参谋部主管业务概括言之,不外乎作战、编制、训练、情报、补给五项,惟欲使上项业务能按照步骤进行及实施,必须分工。盖参谋部譬如人之首脑,参谋则为其神经系,军队犹如肢体,每遇一事先由主脑下判断决心,然后传达于神经系,以命令肢体发挥其本能,但为互相联系使业务不生故障,顺利推行,是又须合作”。^⑦以1938年为例,这一年军令部主要工作包含39个项目,其中第1项就是“策定作战计划,起草作战命令,监督指导作战之实施”^⑧,所以从业务范围的角度来说,战时作战指导业务由军令部承担。军令部在作战指导与实施方面的作用为指挥、协调、监督、指导。

军令部作战指导拟定与实施业务均由第一厅第一处进行,第一处业务有:关于作战计划之策定,命令、训令之草拟及作战指导监督事项;关于奸伪动态对策之研究处置事项;关于伪军反正之策动及运用事项;关于情况之整理判断,战报之汇列及图表之调制,兵棋之布置事项;审核各战区攸关作战之各种计划及部署事项;关于国民党军(含游击部队及特种兵部队)战绩之考查审核及战果之统计事项;关于作战检讨及作战经过之编纂事项;关于国防工事计划之策定审核及设计指导监护查勘事项;攸关作战诸事项之建议;关于本会督战参谋或联络参谋之派遣监督事项^⑨等事宜。因此,第一处职责在于:各科分别与对应的战区联系,获得战况报告以及前线军事情况报告,随即根据获得情报制定相应计划与方案。第一处负责派遣与监督督战和联络参谋,充分掌握各部队平时、战时情况,对各部队训练与战绩均能获取及时信息。战后,第一处汇总各部队战绩,对战况进行检讨与

① 《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10月15日。

② 《诤军委会第一部同僚令》,陈存恭、赵正楷合编:《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236页,例如副部长王俊从步兵学校、高级参谋陶钧由军事参议院、任关宇由海军部、徐佛观由湖北保安处、连络参谋林自秋由参谋本部调来。参见《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额内外调任职员登记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68。《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10月15日。

③ “健生亦谈第一部人事不和情形”。参见《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10月16日。

④ 熊宗仁:《何应钦传》(下),第466页。

⑤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时》(2),第68页。

⑥ 《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演讲纪要》(上),《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第32页。

⑦ 《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演讲纪要》(上),《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第32页。

⑧ 《军令部工作报告(二十七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国军”档案,0027/109.3/3750.8。

⑨ 《军令部第一厅各处室职掌草案》(1943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174。





编纂。军令部的第一处承担与作战指导相关的指挥、协调、监督、指导的工作,是战时军令部实施作战指导的主要机构,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二) 军令部作战指导实施流程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认为:“军令部为全国高级指挥作战机关,对各战区有令动作协调及转移兵力之职权,并须控制强大兵力为总预备军”,“作战、情报、补给,此三者应有相互密切之连络,故军令部之第一厅长每天至少应与各战区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互通电话一次。第二厅厅长对派出情报人员及各战区主管情报者每天至少亦须互通电话一次,而后方勤务部对各战区主管补给人员每天亦应互通电话一次。如此则高级军事机关之主张可以推行至各区,而军令部对于各区之意见与情况,亦有真确之认识,而作适当之处置。根据历来经验,各战区如有错误之处,军令部应随时予以干涉矫正之,如作战部队有不合机宜之处,军令部得直接纠正,不必经过各战区之转折,恐致迟误时机。总之,作战之先决条件,须先有统一之见解,再依据此见解而统一动作,统一指挥,此为军令部应行达到之任务”。他还指出“军令部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对战略预备队之集结与时间,及全般兵力之配备等,务求达到协同之目的,而其最要者为明悉敌情及其兵力与战地形势,此三者实即最高指挥官实施工作计划之主要条件”。因此军令部实施的高级指挥应当“决定战场内之作战方略,如在战区内各集团军、军团等之指挥”,“最高指挥之指挥机关(军令部)对各战区下达命令,只可以训令方式指示……各战区长官部奉到最高指挥机关命令之后,应按其指示之要旨,参照目前情况详加研究,然后再对所属下达适当之命令”,军令部的“战斗指挥必须注意兵力、时间、空间三项,在未与敌交锋乃至作战过程中,关于敌我兵力应预以确实比较,而时间与空间,对于尔后作战上是否协调,亦需周密计划,善为运用,务使互相联合为要”。^① 所以,军令部作战指导遵循组织计划、协调一致以及有效指挥三个原则,以搜集情报、拟定腹案、做好计划为主要内容。

首先,军令部搜集相关情报,以判断日军进攻目的。以武汉会战为例,1938年5月军令部收到情报“敌军今后对华作战计划,以武汉为目标,即将开始其对武汉攻略之外线作战。以北支军为主,中支军为辅”,日军“拟以中支军由合肥进攻颍州、正阳关而至太和,同时抽调津浦南段主力进攻六安、商城等地,袭信阳,策应平汉正面南下之北支军”。军令部由此“判断敌今日主攻在北,不入郑不至悉力南攻,固郑不仅掩护豫西,亦所以固大别山脉”^②,作战指导“以在大别山之东北两正面应预为布置,该方面预想为将来之主战场”。^③ 日军原计划从淮河、长江两路进攻武汉,华北方面则将中国军队牵制在北方,只是因为花园口决堤,沿淮河一线进军的日军改向大别山北麓进攻。^④ 军令部基于情报推测日军主攻方向与日军的预案基本符合,造成日军此役兵力损失较大,渐趋分散,很长时间内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进攻。

其次,军令部综合情况,由蒋介石做出相关指示,军令部做出预案,在作战会报时进行讨论,选择最佳方案并做出作战指导。许朗轩将军回忆:“军令部第一厅,系主管全国陆海空军动员作战业务,其下属各处、科参谋群,每日须向蒋公简报当前各战区战况,同时提出敌情判断,以及国民党军行动方案之建议”,随即“经由讨论、质问与诘难过程,供其下定正确之决心,然后据以拟发作战命令,贯彻执行。也就是说,蒋公须藉助此一参谋群之简报,获得所需资料,经由其自己合理思考分析,作出正确判断,决定至当行动方案,以遂行其指挥作战任务”,因此许朗轩评价“此一简报,极为

① 《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演讲纪要》(上),《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第37—38页。

② 《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8年5月30日。

③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13页。

④ 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





重要”。第一厅派出参谋具有“口齿清晰,长于表达,仪表端正,服装整洁”及“记忆力甚强,反应敏捷”等素质,所以每当蒋介石询问情况时,都可以“都能够引据事证,对答如流”。^①以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为例,军令部认为缅甸战场敌后方交通便利,易于增补,中国军队兵力不足,后勤补给乏力,判断:“(甲)以现有兵力在平满纳或其以北(因平满纳为委员长特规定)作有力抵抗,不利则集结在瓦城附近会战(本案之利,1、进行顺利可望到雨季,尔后作战容易,贡献全局甚大;2、物资粮秣可内运。本案之害,英军不能保障右翼安全,胜算不大,且牺牲大,善后不易);(乙)以最小限兵力持久抵抗,主力逐向滇境撤退,并令第卅六师在祥云以北停止(本案之利,牺牲少,危险小,保持余力震慑川滇。本案之害,战局恐迅速瓦解,物资遗弃,无收购粮秣余裕);(丙)以最小限兵力在瓦城、棠吉以南持久抵抗,以主力在瓦、棠附近行有力抵抗,并抽出伤亡较重部队陆续向滇缅边境撤退,增筑预备阵地,必要时主力向龙陵、畹町,部分向八莫、车里撤退,并向龙陵、八莫屯积军实(本案利害亦参半)。结论,兵力不再增,以免太超越补给能力,陷于不可收拾之窘境”^②,实际蒋介石采纳(丙)案。^③不过由于远征军各部4月24日方才执行,并没有达到原定效果。

又如1939年,蒋介石手令军令部“应切实研究对华北、华中与华南各区敌军进犯我军时,我军如何集中兵力或运用各区部队策应,以打击敌军之方案,须特别专心研究,立定计划详报为要。(此后作战计划,应先取攻势防御,总以先用少数相当兵力,利用工事坚强抵御。待敌军久攻不克,兵力疲惫时,我军再用主力转取攻势,此为转守为攻前,尤其我后期抗战惟一之原则,令各战区切实照此奉行)”。^④军令部随即根据《国民党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拟定《攻势转移部署方案》,确定方针为“加强游击战区兵力,并相继转移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援助我游击部队,打破敌扼守要点,抽转兵力,建立华北军事根据地之企图”。^⑤最终,军令部拟定计划发动冬季攻势以贯彻蒋介石的战略想法。

最后,对拟定腹案进行整理,调整军队部署,从而保证作战指导实施。以徐州会战为例,为阻止日军打通津浦路,中国方面在鲁南集结相当兵力,进行攻势防御……同时在武汉及郑州以西集结兵力,准备诱敌深入进行决战^⑥,为确保这一计划实施,军令部决定调用津浦路南段七十四军,由于战局发展,“五月初,军(七十四军)奉令开陇海路东段殒山”^⑦,实际军事行动是按照军令部的要求调整部署。再以豫湘桂会战为例,为保卫西南黔、桂边区后方安全,蒋介石命令调第二十九军、第九十八军、第九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七军集结贵阳马场坪、都匀、独山间地区,以保贵阳。^⑧军令部早在10月间预先准备,命令“第一战区由豫西抽调有力之两个军(内定13A^⑨、85A)先开湘之酉阳、秀山

① 许承望:《帷幄长才许朗轩》,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46—47、49—50页。

②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4月18日。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作战经过》(3)(以下简称“《作战经过》”),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314页;徐康明:《中国远征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时广东、冀伯祥:《中国远征军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郑洞国等:《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④ 《蒋委员长致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研究华北、华中与华南各区敌军进犯时予以打击之方案条示》(1939年2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编》(1),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所谓条示,多为指示军事委员会幕僚单位应行办理事项。受件者系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军政、军令、军训、政治各部部长,以及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侍从室第一、二处主任等。此项条示,当时受件人必须将条示内容抄录一份,注明奉到时间某月某日某时,然后将原条示缴归侍从室存卷。《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编》(1),凡例,第1页。

⑤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第661页。

⑥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25页。

⑦ 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3年版,第42—43页。

⑧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10月3日。

⑨ A为英文Army缩写,军语中代表军这一级编制。





地区,同时由平汉路东抽两个军开豫西以补其缺(前调陕豫之9A到遂宁,14A到渝,29A到合川,39A到兴山(鄂),98A到都匀(黔),渝之97A已开独山)”。^①以第二十九军为例,军长孙元良回忆他率领所部由重庆渡江,南入贵州,星夜驰御……在都匀、独山之间,奋勇死战,截住了敌军。^②如果不是军令部预先准备,以国民党军当时的运输能力,很难想象这些军队可以及时赶到并阻击日军。

军令部如果判断失误,腹案与战局不符,会造成严重后果。以枣宜会战为例,军令部指导方案腹案为“汤恩伯集团……为予敌严重打击,应以王瓚绪集团协同攻击,其攻击目标之选定,以指向京钟、汉宜路为适当”,“为防止敌在鄂北行迂回攻击,或在鄂南、鄂东方面现行阳动,并为牵制敌之转用计,第五战区鄂北、豫南及鄂东之部队,应采取整个之行动,各向当面之敌攻击”,在作战计划中要求“汤恩伯集团应控置于大洪山东侧地区,王瓚绪集团控置于大洪山西侧地区,完成攻击准备。尔后应相互协同,向京钟、汉宜路侧击敌人”,“在襄花路方面之84A及豫南方面之30A,均应同时向当面之敌攻击”,“李品仙集团应以鄂东部队之主力,积极向鄂东攻击,威胁汉口,并须确实截断平汉线,牵制敌之西进”。^③此战“中国方面估计日军不会进攻宜昌,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也是佯动,因而在第一阶段作战时,将担任河西守备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和江防军主力大部调往河东,以致河西兵力空虚”^④,宜昌失守,打乱了原定计划。日军方面“会战计划的要点是对襄河东岸敌军最精锐的汤恩伯部队以第三师团从正面进行猛攻,并以我军(日军)主力攻击敌军右翼”^⑤,正好针对中国方面的部署。只是由于张自忠所部拼死杀敌,才解救国民党军队主力,但张自忠却壮烈殉国。由于军令部的腹案与作战计划存在较大疏漏,军令部原计划以江南部队吸引日军进攻,江北主力袭击日军汉口后方,迫使日军回援。但由于宜昌突然失守,造成局势被动,国民党军被迫做出决战的态势,打乱原定计划,造成作战指导无法达成。

如果军令部判断准确,对于战事发展会有很大帮助。例如浙赣会战期间,军令部认为日军进攻衢州兵力是抽调而来,分散配置不利于日军战略发展,衢州并没有太大战略价值,遂在会报中提出“放弃衢州决战,将我有力部队向各方面分散并准备打击其向浙赣路再深入”。^⑥蒋介石此时要求军令部拟定“保卫粤汉路长沙、曲江与衡阳之防守计划,应积极策划准备,并令第三战区有力部队其重心应即向西移动,以备策应粤汉路之作战”。^⑦军令部指示第三战区“以主力不断袭击浙赣路沿线之敌”^⑧,并让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保存国民党军实力,以备配合盟军未来作战起见……避免在衢州附近与日军决战”。^⑨如此一来,既保存第三战区有生力量,又策应了之后的作战。

从搜集、分析情报并加以判断,拟定腹案进行讨论,根据战场情况提出预案并提交作战会报,根据腹案确定参战部队,指示其位置与任务,最后根据商定预案做出正式作战计划,此为军令部按照参谋系统原则进行作战指导的完整流程。

① 秦孝仪主编:《作战经过》(2),第677页;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345页。

② 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台北,坤记印刷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271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凤凰传媒出版集团、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990—991页。

④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021页。

⑤ 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9页。

⑥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6月3日。

⑦ 《蒋委员长致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保卫粤汉铁路之防守计划应积极准备条示》(1942年7月9日),《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1),第240页。

⑧ 《保卫粤汉路长沙曲江衡阳各战区协同作战计划》,《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第704页。

⑨ 顾祝同:《墨三九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版,第216页。





三、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检讨:以“豫湘桂”会战为个案

虽然从业务范围具体职掌而言,军令部为战时作战指导的责任机关,而且,军令部也制定出有效的作战指导流程。但是,很难给予战时国民党军的作战指导以正面评价。战时国民党军表面上建立起符合现代军事发展的指挥系统,为何该系统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军令部的作战指导业务为何不尽如人意,值得深入研究。“豫湘桂”会战是抗战时期正面战场规模最大的会战之一,将之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全面研究战时国民党军的作战指导。同时,“豫湘桂”会战发生在1944年,国民党军的作战指导已然成熟,以此作为研究对象较为合适。最后,“豫湘桂”会战集中展现了战时国民党军存在的痼疾,以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作为切入点具有典型价值。

(一)作战指导机构叠床架屋与蒋介石的越级指挥

作战指导及实施是将抽象的战略思想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军事上广义的作战指导是军事战略思想的转化,狭义的作战指导则是野战战略的转化。军事战略,是对军事斗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战略指导者要全面计划、部署、指导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以保证有效地达成既定的政治目的。^①野战战略,则是“指导战区内用兵的艺术”,“以其目的命名,而不以地区或阶层命名”,“欧洲若干国家,则称之为作战战略。从其运用艺术来说,野战战略乃是形成战场以前的造势与用势的指导艺术”。^②野战战略是军事战略的有机组成,必须在军事战略的框架下制定。战时国民政府军事战略的负责机构是军事委员会,制定与实施机构是军令部。然而诚如上文所述,就作战而言,涉及机关就有正副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侍从室和军令部,涉及的办公会议有军事委员会作战会报和最高幕僚会议,参与人员包括军事委员会成员,军事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如此众多的人员参与作战指导业务,势必会造成具体实施中的混乱情形。以衡阳会战为例,薛岳原令第六十二师黄涛所部控制于谭子山、曾坪附近,夹击渡过湘江之敌,但是第六十二师却“忽奉统帅部命令,由谭子山出发,移驻祁阳”,薛岳无所适从。“统帅部的各项战斗指令,都像是一篇完整的理想计划,但多透过白副总长直接命令各部队,等于白副总长为战区司令,薛将军的长官部,等于副本单位。薛将军对整个战局,似无插手之余地。而各部队长也直接以白副总长之命是从,视薛将军之命令,可听可不听。但白副总长远在桂林遥控,而战场实况瞬息万变,以致统帅部万全之作战计划,到达战地时,实况早变,人事已非,遂成明日黄花,完全失效了!衡阳之围,始终未能突破”。^③可见,机构叠床架屋造成野战作战指导权责不明,对战局容易产生消极影响。

雪上加霜的则是蒋介石插手作战指导的实施,特别是喜欢越级指挥。必须指出的是,蒋介石的越级指挥尽管“所造成的祸害,似未如前人想象之大”^④,但确是蒋介石军事指挥广泛为人所诟病之处。

李宗仁这样评价蒋介石的越级指挥,“抗战时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

① 王文荣主编:《战略学》,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② 吴建德、蔡志升:《中国对日抗战战略之研究(1937—1945)》,李君山、杨维真等编著:《荣耀的诗篇——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年学术论文集》,台北,“国防部”2006年版,第410页。

③ 陈寿恒、蒋荣森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第425—426、428—431页。

④ 张瑞德:《遥控——蒋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48页。





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① 尽管李宗仁口述回忆之时不尽客观,但他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

不但所谓非嫡系将领如此评价,即使是嫡系将领亦作如是观。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组长於达将军认为“革命军积下来一个很不良的习惯,使得革命军很吃亏,其原因可能是委员长因为用的都是学生,把他们从无知的少年训练长大,老是觉得这批毛头小子会出乱子而不放心。蒋先生一直到现在都还看他们是小孩子,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心他们去做,而事事干预他们,而且干预得很厉害。打仗是瞬息万变的事,前面一个情况,一直到师长晓得,起码已经经过了十二小时,最快最近的也要两小时才晓得。无线电的操作有一定时间的……拍到侍从室再译好电给委员长看,已经过了几天了。加上又逢委员长休息开会啦,等到他下命令,情况早变了。不是他的命令错,而是情况不同了,照他的指示做,必定打败仗,则是必然的,我们指挥系统的大毛病就在此。军队无法独立作战,力量受到本身的束缚无从发挥,这是革命军积习很深的习惯,也是一个大病,此乃起源于‘毛头小子不放心’的心理。其次,委员长也常越级指挥下级,师长也常越级指挥团长,常使旅长发现兵不知被调到何处。指挥系统发生自相矛盾,指挥官和所属干部因此发生冲突摩擦而自坏阵营。不放心和越级指挥造成作战指挥系统的混乱和作战能力的低落,这两种特色构成‘黄埔精神’,至今仍不能改变”。^② 蒋纬国为蒋辩解,认为蒋介石的越级指挥“事实上他是将部队整合”,“为了后勤补给的方便”。^③ 不管怎样,蒋介石身边亲近的嫡系也诟病他的越级指挥,说明这种现象经常出现。

很多将领对这种指挥方式颇有微词,张治中认为“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哪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即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④ 上述越级指挥是因为“长期指挥小兵团的环境中所养成的习惯,加以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训练与经验所致”^⑤,但其后果“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作战的部门以及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均(对部队调动情况——引者注)一无所知,事后方由侍从室主任通知军令部”。^⑥ 沉稳如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此也发过牢骚。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缅甸作战已完全由蒋先生直接指导,奈何。”^⑦ 军令部曾经抱怨“部队调动,统帅部干涉过严,有失前方机动性”。^⑧

就“豫湘桂”会战而言,这种越级指挥就造成多头指导,引发指挥混乱。蒋介石在调度方面的强势,造成了其部下不敢负责的性格。例如5月间军事委员会作战会报期间,“会报不及两小时,蔚文(侍从室主任林蔚)转达第一战区电话至四五次,闻有时一团之活动,战区亦请示委员长,此非丛脞而何?”^⑨ 徐永昌自己抱怨:“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

①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页。

② 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於达先生访问纪录》,第116页。

③ 蒋纬国口述,刘凤翰整理:《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④ 《张治中回忆录》,第299页。

⑤ 张瑞德:《遏制——蒋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28页。

⑥ 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年版,第30页;王正元:《监听专员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⑦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4月18日。

⑧ 《军令部审查检阅各部队参谋报告书决议案》(1940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7。

⑨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5月6日。





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①刘斐也曾经发过牢骚:“谓委员长感叹无人负责办事,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②徐永昌只能感慨,蒋介石“权责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③然而蒋介石却自认为“本周以河南战事急迫,将领无能,自作战方针至局部处置,皆非亲自留心与处置不可,余几乎身位蒋鼎文之参谋官矣!可悲可怜!然而战局卒能转危为安矣!”^④颇有自得之意,可是作战实效却不似蒋介石自认的那样。这种越级指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既有的指挥层级,有损作战指导部门威信,对军令部作战指导造成的危害还是很严重的。

(二)作战指导业务水准对战局的影响

就“豫湘桂”会战而言,军令部的战略预判乏善可陈。王奇生认为“整个湖南会战期间,徐永昌主掌的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战略部署明显存有缺陷”。^⑤然而,整个抗战期间,军令部作战指导方面对于敌情判断没有发生过如此大的失误。分析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对军令部作战指导水准与战局关系可以更加客观一些。

参谋部门并非小说中的军师,“掐指一算、计上心头”这种状况并不符合现代参谋部门的业务水准。作战指导应当是在分析敌情基础上,对敌方军事举措有所判断,做出自己的应对。即使参谋部门获取大量情报,如果缺乏合理的分析判断,应对方案就有可能无法做到“对症下药”。即使有合理的分析判断,参谋部门做不出相应方案,作战指导意图也无法得到贯彻实施。

“豫湘桂”会战爆发之处,军令部对于获取的情报分析有误。蒋介石对日军动向早有察觉,1944年元旦他在日记中写道:“本年军事目的甲、克复宜昌(六月间)——武汉(十一月间);乙、打通滇缅路(十二月间);丙、防止倭军打通粤汉与平汉路及浙赣路”^⑥,1944年2月25日的徐永昌日记也记载:“据确报敌第一百十六师原驻长江下游,近调武汉一带,另据报敌军约万余开抵鄂西等处。又日前据报敌增兵抢修平汉黄河铁桥并宣称将打通平汉线。”^⑦3月4日,蒋介石认为“一、敌修黄河铁桥,其必企图打通平汉线,应速派空军不断轰炸,二、敌进攻平汉之期不远矣”,并进行“平汉路战事之准备”。^⑧然而徐永昌却判断“沪平各有敌机二批飞汉口,原停有一百十架左右,可共达二百架以上。此与增兵鄂西对照,敌或有企图。由照相及情报悉,敌已将平汉黄河桥修葺,可通汽车,此似是一种姿势,至其打通平汉线之宣传,在今日看则完全眩惑伎俩而已”。^⑨3月18日蒋介石在会报中判断“敌必拟打通平汉线”。^⑩同月21日,徐永昌记载“按各方情报敌一一六师已集中

①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6月12日。

②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23日。

③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5月6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4年5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下同。另见叶惠芬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7),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34—35页。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7册,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639页。

⑤ 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杨天石、臧运祜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战役》,第320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4年1月1日。

⑦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2月25日。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4年3月4日。另见叶惠芬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7),第402—403页。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7册,第591页。

⑨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3月4日。

⑩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3月18日。





武汉,二二师自金华西调,三五师由新乡、汴梁东开。是否出海抑转鄂赣尚难断定,此事殊应防其企图打通粤汉线以为其‘防空上’或‘交通上’之便利(占我衡阳与敌最利)”。^①此时,军令部的判断重点放在防备日军打通粤汉线上。因为徐永昌在军事上认为“守者自由撤退,攻者不能不提心吊胆而被动地跟着前进,后方的连络线,越加长越要留守多数守兵驻守,也越增加游击队袭击的机会,使其第一线的兵力,因而减少,使守者渐渐达到兵力的平衡,于是攻者愈战愈弱,而守者则愈战愈强”,“在以前的各次会战,我们将敌人消耗到相当程度后,即行逐步引退,自武汉会战后的各会战,则将敌消耗至相当程度后,我们便举行强烈的反攻,就是说除予敌以守势的消耗外,再给他以攻势的消耗”。^②此外,他对日军有几个基本判断,第一是认为日军缺乏兵力,不可能同时执行打通平汉路与粤汉路的军事计划^③,不会在华有大动作;第二认为当日军进攻之时,国民党军执行后退消耗再行决战方法即可,蒋介石的判断并没有影响军令部“专业”的参谋作业。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蒋介石尽管判断正确,但是他却没有强行干涉军令部的作战指导。

其后,相关情报不断送到军令部,徐永昌综合情报认为“上海谍报所称敌拟打通所谓大东亚铁路线云云,以余判断其计画可能的先打通粤汉线(一、准备将来在中南半岛之敌利用该路撤入中国;二、妨害我粤汉线以东之机场便于扰害西南机场),即将来敌海空军失败到某种程度,在中南半岛者渐渐撤退,大部循陆,一部由海运至广州,而后北运。又现在打通平汉云云亦嫌费材与费兵,且呼声太高,似在声北击南,但打通粤汉亦需七八师,以上且看敌如何抽兵来”。^④所以,4月17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前后,军令部仍然将重点放在粤汉线一带。基于以上论及的徐永昌对于战略以及战局的判断,军令部才会误判日军动向,导致会战战略上的失利。

河南激战正酣,一战区报告“敌由东北及我内地共抽十至十二师团,集中汉口、信阳、徐州、新乡,五月上旬总攻打通平汉线”^⑤,军令部仍然坚持日军“由关外调入军队达十五师,溯江以进,意在打通粤汉路”^⑥,“敌传打通(恢复)平汉铁路诚无理由,余以为主要在打击我汤集团或抢麦,亦可能为掩护换防”。^⑦直到5月11日,河南战场已经大半沦入敌手时,军令部得知“据敌小田称,敌有打通平汉线后再进攻粤汉线企图”^⑧,方才如梦初醒,对于日军此次行动的规模有正确了解。

当日军作战意图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军令部在会战的作战指导方面缺乏正确的应对。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在作战指导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相应对策也有两种,一是认为粤汉路必定失守,主力不若退至湘桂线或者桂林与敌决战;另一是在粤汉线沿线及两翼与敌节节抵抗,消耗敌军。前者是白崇禧等大部分将领的意见,后者是军令部徐永昌等的意见。薛岳的意见与军令部徐永昌的意见一致。蒋介石赞同军令部的意见,主要原因则是河南战场的惨败引发国际国内批评浪潮,如果不战

①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3月21日。

② 徐永昌:《四年来敌我战略战术的总检讨》,吴相湘、李定一、包遵彭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二次中日战争》,台北,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134、139页。

③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7日。军令部二厅判断“日军配置关外二十七师,关内二十八师部即在我北战场十二个师,中战场十三师半,南战场三个师(每个独立守备队作为一独立旅,两个独立旅作为一个师计算)”。日本海军驻汉口特务机关长中野供词“现在在华日军多属老弱,最近所有对中国作战皆牵制性质”加强了军令部以及徐永昌对于日军不可能大规模发动攻势的判断。《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15日。

④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6日。原计划详见《徐永昌呈倭寇海军如在太平洋失败后其陆军在大陆方面(包括中南半岛一带)作战方略判断》(1944年4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5306。

⑤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26日。

⑥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28日。

⑦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30日。

⑧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5月11日。





放弃粤汉路,则无法平息舆论^①,这其实仍然是政略影响战略的表现。

尽管早在5月15日,徐永昌就命令第一厅制定相应计划防范日军进攻粤汉线以及湘桂线^②,而在此之前蒋介石即电令薛岳、余汉谋进行必要准备,认为“敌军打通平汉线以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③5月19日,当蒋介石与徐永昌商讨战局时,徐永昌坚持认为“豫战敌人今后如何(在情报方面不见敌有后部,现部亦为杂凑,并无持久进攻力)”^④,没有做出几个备选方案应对不同战局。到了29日,军事委员会讨论湖南战局之时,军事委员会在作战会报过程中,相关人员对此次会战的战略构想亦产生了分歧。白崇禧认为“要在湘桂边区或广西境内决战……对攻者来说,像橡皮带子一样,拉得愈长,就愈薄弱,超过了极限,它就要绷折”。^⑤薛岳“坚决要照第三次长沙战役的老样,一成不变地在长沙外围与日军决战”。^⑥具体而言就是“拟将进犯之敌,务须阻止于粤汉路以东地区,故计划在浏阳、平江、长沙、衡阳等要点各置一个军,作坚强之固守,另以若干军控制于幕阜山、湘西、湘南地区,以期分散敌之兵力,行迟滞作战,以空间换取时间,节节阻击敌人,消耗敌力。并预置主力于两翼,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⑦徐永昌认为“湘鄂战局,众咸认粤汉线势且必失,多主张于湘桂线准备,并以北战场反攻为不可能,与其徒作牺牲不若抽撤整理。余至此乃不能缄默。力言湘桂间地形难守而利敌。”尽管战局对国民党军方面不利,徐永昌认为部队有整理休整的必要,但是日军方面经过大战后也会疲惫,如果后退而不作战,日军就会得到喘息机会。不禁感慨“我如此轻轻放过,各该主官不予痛击,抗战前途尚堪闻乎?”^⑧

战局逐渐明朗,军令部在作战指导方面缺少清晰思路,原因仍在对日军作战意图缺乏正确判断。衡阳战事之初,徐永昌认为“敌此次进犯豫西南余湘鄂诸地,咸谓系企图打通平汉、粤汉两路,更有意见打通至湘桂线迄镇南关者,并已在着手准备退守桂林者,似嫌过早。或云敌打通三路以备撤退之用,似亦尚待研究。或云破坏我各机场可以减轻威胁,则又何止此处?”在徐永昌看来,日军兵力不足,难以保障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国民党军坚持以部分兵力骚扰攻击日军,日军必然会因为兵力问题中止作战,而且也可保存国民党军野战部队主力。^⑨因此他认为日军围攻衡阳只是“混时间”,绝对不会进攻桂林,甚至于他否定了自己4月的判断。^⑩6月18日的会报上,刘斐与徐永昌对于日军意图判断产生矛盾。^⑪总体而言,徐永昌对于日军动向的判断是错误的,刘斐分析大

① 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杨天石、臧运祜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战役》,第312页。

②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5月15日。

③ 秦孝仪主编:《作战经过》(2),第643—644页。

④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5月19日。

⑤ 赵子立、王光伦:《长衡战役》,薛岳等:《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

⑥ 赵子立、王光伦:《长衡战役》,薛岳等:《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会战》,第218页。

⑦ 陈寿恒、蒋荣森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422页。

⑧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5月29日。

⑨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6月3日。

⑩ “中南战场敌人将会师衡阳以窥桂林云云。余以为中战场敌进至渌口或即停止,即使扼要窜据衡阳但决不至西入桂林,南战场敌或待中战场告一段落后再动,但一二日即将集结曲江之六十二军北调(本部已令调衡阳,白健生主调桂林甚力)可能引起敌人之提前行动亦未可知。但由于信阳以南敌人不乘大举渡黄西犯之际夹击吾人,及犯湘已近二十日而广州敌未动以观,则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余混时间之应付战事而已。至云打通粤汉湘桂备退一节,劳费皆大,占兵亦多,且暴露颓势,如云尽退,则此时尽可大部用船”。《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6月15日。

⑪ “为章以为敌必冲至衡阳,可能入桂林。余以为敌兵力不足,只要我能力拼,尚不至企图入桂。现我应由长沙起正面仍作持久抵抗之计,两翼看机即与之行决战,敌无深入企图,且略举日前(十四日)之观察,我应在现阶段消耗敌人,打击其侥幸之心,蒋先生熟视余,但对努力打击敌人则极同意”。《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6月18日。





体是对的,徐永昌固执认为日军兵力不足,不足以实现攻势作战,他所判断的日军仍是守势作战则是完全不顾情报透露敌情的结果。其后会报中,徐永昌对白崇禧的作战预案提出不同意见,并最终按照徐永昌判断进行部署。^①

虽然军令部战略判断失误连连,不过公平说来,其判断并非毫无章法。军令部主要担心在于日军莱特湾大海战失利后,中南半岛日军动向。军令部判断中南半岛日军会缩短战线,而不会立即撤军或者坚守中南半岛最终“玉碎”。军令部最为担心的事情是一旦日军从中南半岛撤军,必然经过粤汉路进入中国大陆,打通粤汉路为日军缩短战线之关键,但撤退的日军如果突袭中国西南,则中国西南将面临很大危机。^②这一看法不能不说有一定道理,其计算业已遵循参谋作业要求,因而预判比较有说服力。但是如果分析4月日军被俘的驻汉口特务机关长中野的供词即可发现日军海军战斗力与海上运输力已经大大削弱^③,应当将日军大规模调动与打通南洋交通联系起来。军令部如果至少在战略预判上多几手准备,而不是固守既有认识,就不会一再判断失误了。“豫湘桂”会战的失利,在军令部作战指导方面,恰恰体现传统军事体制中个人凌驾于机构的恶果。建立参谋系统,实现参谋现代化,目的之一就是体现机构在决策中的科学性规范性。特别是在“长衡会战”中,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徐永昌,都将他们个人的判断凌驾于机构系统判断之上。老成持重如徐永昌,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频频出现错误判断,对战局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反作用,不能不令人思考。^④

(三) 诸多相关因素对作战指导业务的制约

除了机构设置和业务水准之外,军令部作战指导受到传统国民党军事体制影响颇深,派系争斗与兵员素质导致战斗力低下,作战指导执行力受到很大制约。

“豫湘桂”会战中,一些骄兵悍将对于调度执行显得很积极,例如长衡失陷之后,军令部要求薛岳将军队撤到湘西,但是薛岳不从命,徐永昌认为“薛伯陵不欲至铁道以西,其心叵测,盖一有事渠颇有划疆自保之意”。^⑤薛岳与其参谋长赵子立也是矛盾重重,矛盾的来源一方面是对指挥权的争夺,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个人恩怨。^⑥再者,不可忽视的是国民党军战斗力的低下,这一点直接导致军令部在作战指导执行力方面存在隐患。衡阳失守时军令部曾判断双方战斗力“综合各方报告加以研究判断,各该师团主力均已抽走,各师团每联队留一大队继续与我作战……(我军)人数及步兵火力约为敌之一倍半至二倍……(我军)与敌人数及步兵火力之比仍约为敌之二倍,最低限度亦在一倍半左右。以番号论约我一师对敌二大队弱,炮兵敌约我之三倍,但敌以道路不济关系始终未得充分使用。空军我为优势,战术上敌比我极为集中,战斗上我远逊敌。以上结论虽云我一师对敌一大队强,但仍系处处打败仗。若怒江西岸我远征军一师对一大队打胜仗,而远征军之装备则优

① “健生力主放弃长衡间之拼命抵抗,逮着手在桂林之防卫战(调六十二军、二十六军、三十七军到黄河、桂林),为章谓二十六军等在外翼如何能早到桂林,文伯谓六十二军即离衡恐摇动防卫军心,余谓不但正面不可放弃抵抗,而两翼后且须尽力督励努力攻击敌侧”。《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6月20日。

② 详见《徐永昌呈倭寇海军如在太平洋失败后其陆军在大陆方面(包括中南半岛一带)作战方略判断》(1944年4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5306。

③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15日。

④ 对于作战指导方面,中国传统上将参谋人员与所谓军师画等号,要求他们料敌如神,如若不能,则不被视为合格的参谋,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现代的参谋人员以及作战指导,是对于战场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判断,根据不同情况拟定相应的指导方案,战时直接选择使用哪一套方案即可。所以个人作用在现在参谋系统中应当弱化,而非强化。

⑤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8月24日。

⑥ 参见赵子立、王光伦《长衡战役》,薛岳等:《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会战》,第214—231页。





于内地部队多多,由此可以完全明了我军战斗力矣”。^①如此战斗力差距,造成国民党军在实际战斗中,攻不能克,守不能固,以至于整个会战一溃千里,贻笑中外。

尽管会战之时国民党军无论在兵力还是火力对比均较日军为优,会战失败反映了战斗力与执行力的低下。究其原因,一在于军队经商。长衡会战之前一年的1943年5月军令部驻长沙的联络参谋电报报告中提及“洞庭湖西北战争发生以来,我军所犯过失均系迭次所经而又很平凡者,尤以兵无斗志,军风纪破坏无遗。军队以做生意为主,视命令如具文,现正蔓延,殊堪重视”。^②《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中提到“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致使部队精神不能团结”。^③二在于训练不足导致作战能力低下。军令部情报称国民党军存在“惟我大部分军队几无甚战斗力……为章报告前方部队作战力太弱,军师长部队皆失掌握等等”。^④会战开始后,徐永昌感慨“而以此次北战场战役观之,我指挥与战斗能力均见减低,此属至堪忧虑,蒋先生意亦相同”^⑤,主要原因是缺乏战术训练以及基本的士兵训练。^⑥这样的战斗力与执行力,以至于衡阳守军将领认为“外围友军避战”,“高级司令部无精算、无配合、不知敌、不知己”^⑦,直接导致了“长衡会战”期间国民党军作战指导中的后退决战,侧敌出击的战略无法实现。^⑧

四、余论

行文至此,军令部战时作战指导业务的开展以及面临的问题已然明晰,不再赘述。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最大的障碍就是蒋介石的越级指挥,蒋介石既然喜欢越级指挥,那么设置军令部是否有叠床架屋、多此一举之嫌呢?仔细考虑,当时设置军令部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设立军令部是适应战时体制、整合战时机构的要求。“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政府设置大本营,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决定改设“国防最高委员会”,以统一党政军之指挥。1943年9月蒋介石继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政府的行政权已集中于主席之手,五院要向主席负责,独立行使职权已是名不符实。^⑨在这一体制下,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全部掌控于蒋介石一人之手。由此观之,从大本营设置到军事委员会改组,就是因为大本营体制不适合战争要求,存在诸多缺点。因此,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取消大本营既是“为适应持久战之需要”^⑩,也是为了集权的需要。随着战时体制的改变,掌管作战计划、作战指导的第一部也随之改组成为军令部。这一过程,从军令部的角度而言,主要是解决第一部的混乱情形及实际存在的问题,故而必须“解决军事机构之改革”^⑪,为持久抗战做准备。军令部成立之时,国民政府存在原参谋本部与第一部并存的状况。原参谋本部的核心,主管作战业务的第一厅第一处当初全部调入第三战区的参谋处^⑫,第一

①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8月7日。

②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3年5月14日。

③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301页。

④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3年5月29日。

⑤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5月28日。

⑥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300页。

⑦ 葛先才:《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130页。

⑧ 参见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杨天石、臧运祜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战役》,第316—317页。

⑨ 荣晓燕:《国民党抗战时期政治体制述评》,《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32页。

⑩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第663页。

⑪ 《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12月19日。

⑫ 详见李云汉校阅,胡春惠、林泉访问,林泉记录《尹呈辅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部成立之初人员来源复杂。1938年军事委员会改组之后成立军令部,整合原第一部和参谋本部人力资源,吸收各方面人士加入,为机构有效运转打下基础。同时,成立军令部利于制约军队中林立的派系。如前文所述,战时蒋介石为整合中国各派势力,团结抗战力量,尚能做到捐弃前嫌,能够贯彻“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精神,曾经反对过他的白崇禧做了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程潜为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行营主任,李济深为桂林行营代理主任,张发奎为四战区司令长官,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等等。至于何应钦,由于他资历老,且曾经对蒋介石有过不利的举动,所以蒋绝不会将全军指挥大权(即军令权)交给何应钦,否则会产生尾大不掉的后果。此时,成立军令部,是蒋避免指挥权过分集中在某一个机构的策略,利用何应钦的声望制约军令部,利用军令部的职权剥夺何应钦的实际权力,其实质与明太祖朱元璋设置兵部和都督府,使指挥权与带兵权分离的举措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成立军令部客观上达成蒋介石“军令统一”的目的,这是设立军令部的副产品。所谓“军令统一”源于1937年9月17日国民政府训令提出的“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①有论者认为战时蒋介石只是通过“军令统一”达到分化杂牌,造成清一色黄埔系的目的,军令部的设立,为统一指挥调度当时全国各派系、各地方军系提供了媒介。有论者提及“战争为蒋介石改造国民革命军、消弭派系观念、统一军政军令提供最佳时机。地方军事集团表示接受他的领导,将军队开赴前线。一些地方军事集团失去原有地盘,在兵员补充、后勤供应、作战指挥方面需要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作为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党政军大权”。^②当然,这样一来,不免让一些地方派系的首脑产生疑惑,即蒋介石是否会通过作战指挥牺牲或者吃掉他们的军队。例如李宗仁多年之后口述其回忆录时就认为“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③一些战区长官也会对蒋介石的越级指挥产生反感。

军令部的设立使其成为蒋介石的避雷针,达到蒋介石实际指挥战争,而责任则由军令部分担,同时避免各战区、各派系反感的目的。例如第一次长沙会战之时,蒋介石战前判断有误。^④可是唐纵却认为“打了两年仗,我们最高统帅部军令部对于作战指导,毫无进步,不胜浩叹!敌人攻长沙兵力,既判明系自鄂北鄂中调来之第三师十三师,我即应向京山孝感汉口方面反攻。孙子云,攻其所必救,才能打击敌人进攻长沙之企图。事过数日,白主任来电请求,才如此决定”^⑤,认为军令部处置失当,感慨道“西南行营决定放弃长沙,军令部认为处置失当,颇有微词。长沙难守,固属事实,但放弃太快,又无出击计划,不无可议之处。如能在羊楼司出击,足以牵制敌人前进计划。同时既知敌人由鄂北调用第三师、十三师协攻长沙,何不在鄂北鄂西加以反攻,其效当胜于正面反攻无

① 《国民政府关于集党政军权于军委会委员长统一指挥训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② 李宝明:《“国家化”名义下的“私属化”: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的控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225页。

③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8页。

④ “一、逆攻击长沙兵力必六师以上;二、要薛岳亲往指挥(赖有此耳)。按今春敌陷南昌时蒋先生曾策定只要认清敌为真面目进攻即放弃前线诱敌入长沙而予以打击,能否恢复长沙不计也。白、陈、薛皆同情者。今则以营田之敌一部已窜过汨罗线后之归义,通城敌一部窜入至长寿街以北某地(其余前线对战颇力,敌人损失较我为大),行营遽令开始撤退,蒋先生因过去陈、薛等如何如何布置逆袭敌人之轻进,遂希望长沙成功,忽略汨罗线之持久,将来长沙之逆袭亦必因重视游击而轻彼无谓之牺牲也”。《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9月26日。

⑤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39年10月2日,第101页。





疑”^①,却不知道军令部只是执行蒋介石战前的部署,自身对此也颇为不满,其实就是代蒋介石受过罢了。同样情况发生在第一次远征印缅作战的时候。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徐永昌日记写道:“缅甸作战已完全由蒋先生直接指导,奈何。”^②刘斐则讽刺蒋介石:“委员长如围棋者,然看已输了,将棋子一扔(因过去对缅作战十之八九由委员长直接指挥,仅将电稿交示而已)。”^③

随着战局的发展,军令部在指挥系统中地位渐次明晰,其主管作战指导业务的作用日益凸显。当国民党军在战时着手建设参谋系统之时,其在作战方面就会随之形成指挥层级。如此一来,指挥层级各部门相应业务范围就会明确,作战指导方面工作由军令部办理就会成为共识。例如徐州会战中,军令部先拟定作战指导方案和作战计划,其后李宗仁则密集向军令部汇报战况以及情报。在前线督战的军令部两位次长熊斌和林蔚也曾电报军令部汇报情况。会战结束后,李宗仁则迭电军令部汇报战事总结。^④大体说来,抗战期间一般军事命令、作战计划或者作战指导均由军令部发出即可,只有皖南事变前夕,颁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令才先后由军令部以及参谋总长和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这说明了在国民党军内部“军令统一”的理念具有一定的共识性,尽管这种“军令统一”只是初步的,还很难做到真正的统一指挥。不过所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成为一种基本共识,军令部可以利用自己相对“超然”的地位整合国民党军指挥。既能在民族大义之下指挥各派系军队,又能按照指挥系统实现统一指挥,可谓一举两得。

综上所述,军令部在抗战时期的作战指导业务制定与实施方面有其相当作用。军令部是指挥系统的关键所在,负责军事战略的制定,作战计划的拟定以及军事命令的发布,起维系指挥系统运转的作用。在业务方面,军令部负责作战指导的制定与实施,上对蒋介石负责,下沟通战区与各作战单位,职责范围是明确的。不过,蒋介石为了集权在手,刻意模糊各机构实际权力,造成在作战指导实施过程中,军令部不能充分发挥指挥效能。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的实施面临诸多羁绊,实际发挥作用大打折扣。

[作者叶铭,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39年9月27日,第100页。

②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4月18日。

③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4月30日。

④ 参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23—628、640—641、643、649、653—655、661—662、665—666、668—679、683、689、691、696—698、703—706、708页。

